

## 农

民、大学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农学家、烟草栽培专家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诗人……要在一个人身上有机地凝聚如此多的社会符号，并且自然妥帖，很不容易，但王绍坤做到了。

采访中，王绍坤多次自然地强调自己来自农村，曾经是农民。

的确，他这一辈子始终和“农”字滚打在一起——本身是农民，干过农活，读过两所农业大学，几乎天天和农田植物（烟叶）打交道，王绍坤也以此而骄傲。

漫溯他自1978年以来的读书和做事业的经历，一个“农”字符串连了王绍坤这些名头，也串连了他的事业。

或者，如果用一种绘画的颜色来框定王绍坤这35年的阅历，主色调就是一个“绿”字，他的学业和事业都碧绿如连天的芳草。

同时，他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，和著名的永远年轻的诗人海子一样，对土地，对庄稼，对农民有着骨血相连的情感——本文大标题来自海子《十四行：王冠》里的诗句。



王绍坤在他的“车间”里

# “用你美丽的叶子，缠绕我的竖琴”

——王绍坤的“农事”与“诗作”纪事

□本报记者 陈昌云

## 一片绿叶在王绍坤心中的分量

2013年的中秋节之前和之后，我采访了王绍坤两次。

“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植保，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植物病理学，也就是学防治植物病、虫、草害，烟叶作为植物，它的病虫害的防治和其他植物一样。”

每次和王绍坤聊天，感到很舒服，他真诚厚道，平实平和，交谈中总是不断提醒记者，“不要把我写得太好。”

对人对己、对事对物，他认识问题总是力求平和，担心走到极端。

王绍坤担任过红云红河集团的原料部长，现今，虽然他的头衔是集团总裁助理、调研员，但依旧协助总裁主抓整个集团的原料工作，其实，无论是在曲靖，还是在昆明，从1986年9月以来，王绍坤和那片绿色的叶子打交道已经整整27年了。

只要具备起码的生产乃至生活常识，没有一个人会对生产原料的重要性等闲视之。

一切物质生产都涉及原料，它是一切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，因此，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这样的国内大型烟草企业来说，“原料”两个字相当厚重，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有了原料以后的所有生产工序，王绍坤对此的解读是：“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，我认为，原料是本质性的。”

“原料是基础，否则生产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”王绍坤说，“几十年前，云南曾经因为原料缺乏，卷烟时烟叶中不得不掺入冬瓜叶、荷叶等替代物，此外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。”

## “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，你让我自由”

在近40年风雨如磐的时空里，谁能想到一页菲薄的白纸竟然铸就了一个年轻人的绿色命运。

1974年7月，17岁的农村青年王绍坤在高中毕业后很“自然”地回到农村“修理地球”。

看着死气沉沉的乡村，每日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周而复始的乏味生活，王绍坤很绝望。他回忆说：“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3年，当时感到自己永远难有作为为了。”

从某种角度上说，王绍坤的痛苦感，是来自他心性的踔厉奋发与挣扎于绝望现实的无奈，这个从初中就开始以诗言志的年轻人，觉得自己有舒翼苍穹之志，却终其一生可能都要抑郁地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心中颇为不平。

但机遇终究要眷顾有志者。

1977年，伴随改革开放的先声，国家恢复了大学中断10年的高考，王绍坤精心准备，毅然报名逐鹿考场。

命运女神青睐了这位20岁的年轻人，他幸运地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——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将他的命运逆转了，“原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在农村修地球了。”

他说，他当时竟然是“喜极而泣”。

高考几个月后，在1978年3月28日这天，王绍坤收到了来自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，极度亢奋下，他写下一首首言志诗，记录他绝望中迎来人生转折的激动心情。

王绍坤承认，后来迄今35年的人生历程证明，的确是这页菲薄的纸片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。

马克思总是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定义“人”及“人的发展”，他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一文中说过：“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”。

王绍坤个人的发展同样得益于“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。”

或者换句话说，拜其所遭遇的时代所赐。



王绍坤工作照

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说，“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，你让我自由。”

4年本科毕业后，1982年1月，王绍坤分配回到当时的曲靖地区农业局工作，“先是到行署人事局报道，我们一共21名大学毕业生，乘坐一辆车回到曲靖，此时临近春节，按人事局安排先回家休息过年，年后才上班。”

上班后，王绍坤被派遣到嵩明县杨桥公社蹲点，“我在公社农科站挤时间看书，准备参加5月份的研究生考试。”

仅仅工作半年多一点，同年8月，王绍坤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硕士研究生，再度过上了在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、食堂几个点轮回的学生生活，又是3年后，1985年7月，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王绍坤从湖南“跑”回云南，来到他的本科母校云南农业大学任教。

王绍坤当时想教书，云大、师大都要他，他自己觉得自己学的是农科，在那些大学教书不太“科班”，云南农大也要他，于是就回母校工作了。

在农大工作了一年多，1986年9月，王绍坤调回曲靖，来到地区烟草科研所工作，开始了他作为“烟草人”的生涯。

## “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”

大地清澈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女人，农民出身的王绍坤觉得自己从她那里来，还是应当回到她怀中去。

这次回到大地，他选择的媒介是烟草。

“从农大出来，可以选择到很多单位去，为什么要到烟草？”王绍坤说：“当时烟草很冷门，学我这个专业的，大多把目光投注在水稻、玉米、小麦等主流农作物，关于烟草，当时就连资料都极少。”

这里需要饶舌的是，王绍坤想到烟草科研所工作，与今天人们对烟草行业的种种艳羡毫无关系，那时节的烟草行业不像今天这样摇曳多姿，成为年轻人求职的“焦点”，相反，烟草行业很不受人待见。

碧绿的烟叶，有着美丽的忧伤，“比如花叶病号称烟草之癌，至今没有根治办法，但它们后来采用综合防治，基本把它控制住了。”但这些需要克难的领域，恰好给刚进而立之年的王绍坤一个自由翻腾挪的巨大空间。

王绍坤记得，当时的烟草隶属于供销社下面的经济作物公司的一个分支，那时效益极差，供销社与烟草分道扬镳时，“往往是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才被分到烟草公司。”

他从“冷”烟草中触摸到了即将来到的“热”脉搏。

“当时的烟草病虫草害很突出，影响了卷烟的产量质量，我如果投身这个行业，可以干出点成绩。”王绍坤从自己专业技术角度出发看到的“热”点。

更重要的是，结合他所学的专业，继续睡武前人，研究水稻、玉米、小麦等主流农作物，要想出点成绩，殊为不易，但由于烟草的“冷门”性质，不被包括农业科研人员在内的大部分人看好，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振翅翱翔的浩瀚天空。

王绍坤坚信，面对烟叶的病虫害防治，只要自己迈出一小步，就是这个领域的一大步。

“我是个农村人，不是闭门造车靠理论吃饭的人，当时农艺师搞技术推广，研究人员则闭门搞理论研究，而应用型研究人员很缺乏。我想我去搞烟叶病、虫、草害的防治，兼顾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，还可以推广到生产一线。”

采访中，王绍坤反复“唠叨”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是农民出身，研究半天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我会于心不安。”

1986年9月的一天，王绍坤来到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烟科所报到，正式成为烟草人的一员，烟科所只有十二三人。

随着他回到曲靖工作，不经意间还书写了曲靖地区8县1市的高学历历史，“当时曲靖全地区有540万人，我的学历最高。”

采访后，王绍坤请缨要求下乡，把当时曲靖地区8县1市全部跑一遍，他人地两生，而且当时出差还时常要“介绍信”，王绍坤要一口气跑完全地区，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给他开的“介绍信”采取了笼而统之的“通称”，王绍坤还记得，“介绍信是这样开的——各县市烟草公司，兹有本公司烟科所王绍坤同志到你地考察烟叶，请予接谈。”

凭着这张“介绍信”，他带着两双鞋，一双绿色的“解放鞋”，一双皮鞋就下乡了，没有照相机，他就用笔记，采集标本，“对烟叶的病虫害，我知道的就给当地公司的同志讲，不知道的，就采集标本带回来用显微镜分析。”王绍坤花了23天把曲靖地区全部县市跑了个遍，“做到心中有数，给领导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，提出建议，供他们决策参考。”

“我写的报告一是有参考作用，再是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。”时年不足30岁的王绍坤，其工作表现令公司领导满意，“那时候下乡很艰苦，谁都不怕下乡，我是研究生还主动要求下乡，领导很高兴。”

工作局面打开了。

后来，连续6年，王绍坤都蹲点下乡，搞优质烟示范和病虫害防治，当时缺乏有关烟叶培育和病虫害防治的书和资料，王绍坤就靠试验示范，“对了就做示范，不对就自己试验。”花了6年时间，他把曲靖地区大部分烟叶的病虫害规律搞清楚了，然后拿出一个整

治方案，做优质烟叶生产试验和示范。“渐渐地，烟叶质量高了，烟农收入逐渐增加了。”

这期间，王绍坤真正回到了农民的点位上了，整天一身一身泥地在田地间和酷热泥水搅在一起，“搞农业就得吃苦，不到田里，不蹲点，不和农民打成一片，人家不理解你，还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。你不是什么官，要人家信服你，你搞科技要推广，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才接受，科技不能推广，搞了半天还有

治方案，做优质烟叶生产试验和示范。“渐渐地，烟叶质量高了，烟农收入逐渐增加了。”

这期间，王绍坤真正回到了农民的点位上了，整天一身一身泥地在田地间和酷热泥水搅在一起，“搞农业就得吃苦，不到田里，不蹲点，不和农民打成一片，人家不理解你，还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。你不是什么官，要人家信服你，你搞科技要推广，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才